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y Ming-cheng M. L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ugust 2002, 236 pages, cloth US\$49.95, paper US\$19.95

書評回應*

與評論者對話，對一個作者來說，是一份知識上的喜悅，也是一種少有的良機，尤其當評論者透過批判性的閱讀，把書中的論點帶到新的場域。我正是在這樣的喜悅與良機之中，以感謝的心情，拜讀了姚人多教授對於拙作 *Doctors within Borders*¹ 的書評，並以這篇回應來延續對話。然而，在我跨進評論者的論述之前，讓我暫時先回顧本書原始的出發點，我希望能用我的述說——而那是一種與姚文非常不同的述說——來呈現我的論點。這兩種述說之間有幾方面的差異：一、姚文與本書對「介於當中」(inbetween)及「混雜」(hybrid)這二個觀念，有不同的定位；二、「身分論述」(identity narratives)是本書關心的重點之一，姚文卻未多加討論；三、本書視「國家」為影響台灣醫師經驗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非唯一因素，姚文則強調殖民地國家機器有權決定一切；四、我將本書中程理論(middle-range theory)之貢獻，界定為對「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重新構思，姚文卻誤以公民社會為本書的核心理論。這些作者與評論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可望成爲一個新的「社會學上的拼圖版」(sociological puzzle)，也許比原書更有趣，可以邀請更多的讀者加入對話。

本書記錄並分析了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培養一批台灣醫師來作爲殖民醫學的本土代理人(local agents)，以及其「意料外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也就是這些醫師的矛盾的社會位置及其曖昧

* 姚人多書評刊載於台灣社會學第四期(2002)，頁 252-257。

1 本書書名 *Doctors within Borders*，是受著名的團體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無國界醫師) 所啟發。*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強調「醫師無疆界」的理想，*Doctors within Borders* 則討論此一理想在實踐上所遇到的困難，彰顯出族群、國家等「疆界」對於科學與專業之建構(construction)。

(但充滿創作性)的集體身分論述。具體而言，台灣醫師經驗了族群與專業之間的一種緊張關係，而這種關係的轉變，促使這個社會群體由反殖民的「民族醫師」轉變為反動員、然後終而成為嘗試超越族群的「醫學的現代主義者」(medical modernists)。這段歷史留下許多原始資料，我自己也作了回顧性深度訪談。我在其中補捉到醫師們的這些身分論述，從而體會到他們的身分論述，已由殖民政府的二分法思維(親日v.s.仇日)中叛逃出來，而以他們自己的聲音，掙扎著去闡述其自我認同的矛盾與混雜。這樣一個故事，有著超越個案研究的理論意涵——關於此點容後略述。

當然，社會學家可以選擇許多不同的方法來閱讀這段歷史，各有其理論上的原因及限制。姚文中肯地點出我的基本理論取向——而這本書正是表現我的理論取向之一例——也就是我的關係性思維(relational thinking)。正如姚文所說，我將「歷史中的行動者」(historical actors)視為位處多重結構力量之交差點，而不是單一社會制度(institution)的代言人。因此，我的書將「專業」(profession)構思為一個不斷與其他社會範疇互動的結構，而且不只包括社會學家慣常視為與「專業」互動密切的「國家」及「市場」，而且包括社會學家一般認為應在專業化的過程中漸失其重要性的「族群」。在中程理論的貢獻上，我提出一個比較廣泛的觀點來看待專業化；具體的論點是，專業乃是鑲嵌(embed)於多種社會網絡中的範疇，且當被視為一個身分成形(identity formation)的據點。在廣義的基本理論取向上，這是一個如何操作化「關係性思維」的例子；我在理論與實踐中一致指出，關係性思維包含兩個主要的分析要點(analytical parameters)：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的「介於當中」(inbetween)的社會位置，以及其混雜的(hybrid)身分論述。

我必須澄清，在本書的構成中「介於當中」與「混雜」均為一般性概念(general concepts)。台灣醫生的經驗則是一個實例，呈現此二抽象概念的具體運作。借用 Charles Ragin 的話來說，台灣醫生的經驗，在本書中被建構為「介於當中」與「混雜」等觀念的實例之一(a case

of)。因此，在姚教授的評論中，他提到「混雜……幾乎是殖民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個普遍現象……用這種概念來說明醫師的自我認同其實無法把醫師的獨特性清楚地標明出來」（頁 256-257），似乎誤解了我的原意。「介於當中」（以及相關的「混雜」），本來就不是為了論述醫師的獨特性而量身定做，姚文批評我所沒有做到的，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承諾過。我所承諾要做到的，是說明「介於當中」、「混雜」等概念，對一般的社會學研究能有甚麼用處；我所承諾要做到的，是我要將這兩個抽象的概念，落實在一個實際的經驗研究之中。我完全同意殖民地的人們普遍都是「介於當中而混雜」，但他們「介於當中而混雜」的內容與意義，卻各不相同。² 我認為要實際了解個中差異，我們只有不偷懶地去作許多個案研究。這樣一個大工程，總要有一個開始之處，醫師就是我選擇的起點。

那麼醫師的獨特性到底表現在哪裡呢？在於他們介於專業與族群之間的定位與掙扎（姚文提到辜顯榮的「混雜」，我想必然與醫生們大不相同，至少「專業」的組織、利益、以及文化，大概和他沒什麼關係）。如前所述，要了解這些醫師的經驗，我們除了去了解他們的「介於當中」（而且不斷改變）的社會定位之外，亦須分析其混雜的身分論述。可惜的是，姚文在相當大程度上，忽略了我對身分論述的討論。然而，既然在我的論點中，關係性思維的 *analytical parameters* 包含「介於當中」的社會位置，以及「混雜」的身分論述，忽略後者，就實在不能完整地看待我的分析。同樣地，既然我的論點是，醫師的特殊性乃是表達於其「介於當中」的社會位置與「混雜」的身分論述之實際內容中，忽略後者，就實在難以公平地評論我對醫師之特殊性的討論。舉例而言，醫師的特殊性，表達於他們述說出來的一個複合身分，也就是「台灣人醫師」，尤其這個述說中的創造性（如在醫學與政治之間的連結）與矛盾（如自認為民族之保姆但卻不能在市

2 Anne Orloff 在一學術會議中提出，本書的貢獻之一，在於提出一個分析的方法來討論不同的 hybrids；Orloff 認為這是歷史社會學對文化研究的一個貢獻。見 Anne Orloff,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Modernity Worksho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pril 2001。

場利益上與當時台灣人對於「醫藥降價」的要求妥協)。或者到了後期，醫師的「混雜」，相當程度地反映在他們充滿張力的「醫學現代主義者」之論述，在其中他們嘗試去擁抱一個「超越族群」的現代性；他們壓抑族群這個主題，但卻又不能超脫它的牽絆，因而表現出一種「碎裂的意識」(fragmented consciousness)。我相信讀者們對於我在醫師身分論述的分析上，會有不同程度的接納，以及不同方向的延伸，甚或環抱雙臂對我說，妳的分析說服不了我。但我必須向讀者們據理力爭的一點，是請讀者們認知，身分論述乃是本書的主要關心所在。

姚文對本書的主要批評之一，是本書隱藏著「國家機器化約法」(state reductionism)。姚文認為，我繞了一大圈談「關係性思維」，結果只是不甘不願地承認國家的力量。他認為，民族醫師，與醫學的現代主義者，追根究底，都同樣是國家的工具，後者被政治化，前者又何其不然？兩者的差異，不過是反映出殖民政策之改變罷了。我認為，如果是姚文願意認真看待我對身分論述之分析，他就會看到「民族醫師」與「醫學的現代主義者」有許多其他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絕不是國家的力量一手造成的。如前所述，這兩個時期的醫師，對其專業及其族群之結合(integration)，幾乎完全相反，然而各有豐富之內涵。國家政策，自然會影響(shape)醫師之社會定位與身分論述，但絕沒有決定(determine)「民族醫師」、「醫學現代主義」，此等論述之內容，否則，我們大概更應該看到「殖民者之代理人」、「帝國之醫生」之類的身分論述。

姚文與本書在這一點上的爭議，或許反映出我們在理論取向與政治態度上的不同，這是見仁見智之議，但不妨將我們出發點上的差異略加闡述。姚文認為，這三時期之醫師，均為政治化之國家工具，至於到底誰是哪一種工具，則並不重要。我卻不同意此一觀點，理由有二。其一，本書的書寫目的之一，是希望從被殖民者的立場，來閱讀這段歷史，以期能「重新發現被殖民經驗的意義，因為這些意義可能是在『殖民者中心』的史觀中所看不到的」(Lo, p.193)。一群被殖民

者是否是國家的工具，當然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想要了解被殖民者的經驗，這絕非唯一的課題！就算都是國家的工具，被殖民者面對不同的掙扎與矛盾，這些掙扎與矛盾，殖民者長期忽略；今日的殖民研究卻正該詳加探究、深入理解。其二，我認為醫師們被政治化的程度與方式上的差異，是非常重要的；我不願意把他們貼上「國家工具」的標籤，視其為一丘之貉，就把個中差異一筆勾消。在理論上，姚文與本書之爭，類似 Terry Johnson 與 Keith MacDonald 的辯論，³ 在政治意涵上，我認為輕度的政治化總比重度的政治化好；以改善本土衛生來作為「國家工具」總比被徵調到南洋當軍醫好；能有「台灣人醫師會」總比被強迫加入日本醫師會好；能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總比被禁止使用漢文好。

姚文對本書的第二個主要批評，是我「杜撰」了一個其實並不存在的台灣公民社會。我很願意借這個機會來談一談公民社會，但讓我先強調，這樣的討論，就已經不是在討論我的書了。如前所言，本書的確期望能有個案研究之外的理論貢獻，因為在書的初章與結論均有詳加討論，在此就不多浪費讀者的時間。簡言之，我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對「專業化」這個概念的進一步發展，著重於「專業」與「族群」、「性別」、「國族」等之互動，來了解專業化過程中之身分建構。這樣看待專業化，也希望能對殖民史的瞭解有點貢獻，讓我們看到殖民者號稱要「現代化」台灣，台灣的醫師關心的卻不是如何「被現代化」，而是如何自己去「現代化」自己(not how to be made modern, but how to make themselves modern)；他們固然被殖民，卻不是全無「能動力」(agency)。而在宏觀的理論上，這樣看待專業化，也希望在「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議題上稍有建樹。殖民地的專業者，面對的常是一個「用他們的科技來解決我們的問題」的

3 MacDonalld 認為，以 governmentality 來看專業化，視專業為國家的僕人，有其理論上的限制，詳見 Keith MacDonald,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Chapter 4. Johnson 的論點，可參看 Terry Johnson,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xpertise," pp. 7-24 in *Health Professions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eds. Terry Johnson, Gerry Larkin, and Mike Sak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情形。本書指出，在「他們」v.s.「我們」的二分法之外，專業者更可以試著去把「他們的科技」變成「我們的科技」，從而尋求具主體性的現代化。我視「現代性」的發展為一個「混雜化」(hybridization)的過程；「西方」既不能代表純正(authentic)的現代性，「東方」也絕非被排除在現代性的創建過程之外。在專業化這個議題的對話上，我的評論者未置一詞，但我想強調，本書關心的中程理論，是專業化，而不是公民社會。

要我來討論公民社會，我其實十分樂意。我的書當然也用到公民社會這個觀念，但因為這並非本書對話的主要理論，書中並未對這個議題多加著墨，⁴借此機會將我對公民社會的看法略作說明，並對姚文對我的批評試加回應。姚文點出他對公民社會的定義（頁 255），所以讓我也提供我的定義。簡言之，公民社會包含兩個面向，一、存在於國家與家庭之外的具自主性的自由結社組織(a network of autonomous associations)，二、這些自由結社組織中的成員所共同享有的一種「文明的文化」(a culture of civility)。社會學家多半比較關心自由結社組織的發展，但在由蘇格蘭啓明時期(Scottish Enlightenment)以至黑格爾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公民社會也必須包含一種能讓自由結社組織中的活動變得比較「文明」的文化傳承，也就是一種願意互相容忍、不彼此強迫的共識，能認知社會中的多樣性卻又不至於因為彼此差異而分崩離析。至於在自由結社組織的空間中，固然有許多組織是具政治性、動員性的（如社運組織），更有許多團體是非政治性、非動員性的。誠如 Mary Ryan 所言，公民社會乃是一個深具「內部差異性」的結構(a highly differentiated structure)。我建議，我們不應用一種「全有」或「全無」(either/or)的觀點來觀察公民社會，而應去了解一個社會發展公民社會之雛形到了哪一個程度，有哪些特色。如果我們

4 我對公民社會的理論，是在寫完 *Doctors within Borders* 才開始詳加討論。請參閱拙著：Ming-cheng Lo and Christopher P. Bettinger,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a 'Familial Society' in Japan," *Theory and Society* 30, no.2 (2001): 237-279; Ming-cheng Lo and Eileen Otis, "Guanxi Civility: Processes, Potentials, and Contingenc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forthcoming.

只有在一個公民社會完全發展成熟之後才開始研究它，我們就永遠無法了解其自「無」到「有」的歷史過程，也無法認清這個過程對於成熟之後的公民社會的影響。我特別關心「初生的公民社會」(nascent civil society)，認為其制度之建立、文化之發展，雖不夠完整，但去研究其不完整的存在，比去宣判它的完全不存在，要來得中肯而有意義。稱之為「初生的公民社會」(本書有時也稱之為"emergent civil society")，可在理論觀念上與成熟的公民社會有所區別，並與 Mary Ryan, Mayfair Yang, Agnes Ku, Margaret Somers 等學者相似地、強調公民社會的歷史性(historicity)。在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方面，本書的第二、三章均述及當時的初生台灣公民社會之發展跡象，第四章則論到此一初生公民社會的萎縮。姚文認為本書將公民社會視為「先驗、自然的東西」，這樣的評論，忽略了我的歷史分析，似乎有欠公允。姚文與本書，在這一議題上，顯然有不同的出發點，我認為 1920 年代的台灣存在一初生的公民社會，姚文對此加以解構；他認為當時完全沒有公民社會的發展跡象，我也想對此打上問號。我還以為姚文所提到的公民社會之要件(頁 255)，其實是存在於公民社會中的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在觀念上不宜與公民社會劃上等號。⁵

姚文與本書的君子之爭，讓我有機會用他人的眼光，來反思自己的論點，並使我能將本書的論點，延伸到新的對話之中，本書的創造性在這樣的實踐中變得更充實了，而我也由作者變成參與者，期待與更多人共享發言權。

駱明正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社會學系副教授

5 見 Jean 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2);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Mary Ryan, "Civil Society as Democratic Practice: North American Citi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21-246 in *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obert Rot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